

习仲勋与广东改革开放

□ 韩晓青

1978年4月，年逾六旬的习仲勋接受中央的安排到广东工作。他在广东工作的时间虽短，只有两年十个月，但却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领导和团结广东省委、省政府班子，从整风着手开展拨乱反正，彻底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

“文革”中，广东是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工作任务繁重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应该从哪里着手？习仲勋来到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广东省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和广东省委一致认为：要开拓广东省工作的新局面，首先要解决广东省干部的思想问题，决定采取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1978年6月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在习仲勋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的整风，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让干部大胆讲话，同时在对人事的分析上，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可以说抓住了广东省当时的关键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时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说：“省委扩大会议开得好。这个会议抓住了广东工作上去的要害问题。习仲勋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有党性、有革命毅力，来广东才两个月，就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路线问题，一个班子问题。”

当时在涉及指导思想这个根本问题上，还存在着“两个凡是”的束缚。1978年夏季，在胡耀邦的主导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光明日报》随即在第二天进行了转载。以此为标志，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序幕。1978年9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人民日报》在9月20日对广东省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报道，并加了导语：“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

意义的问题。”习仲勋是见诸报端的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开展中，平反冤假错案也提上了日程。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原则，习仲勋促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推动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1月召开，习仲勋出席会议并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他就尽快回到广东，并在1979年1月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要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会后，除了少数省委常委留在机关外，以习仲勋为首的八位常委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分赴八个地区，在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随之拉开。

此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之前的1978年下半年，广东就有部分社队开始尝试恢复曾经搞过的“包产到组”，并相继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1978年冬天，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行“三定一奖”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同年底广东省委又提出实行“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对此，习仲勋是充分肯定和支持的。1979年1月，他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面到推行。”

改变“以粮为纲”的局面，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也是广东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体现。在很长时间内，广东同全国一样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1979年1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生产量、国家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调整粮食和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后，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广东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明显的效果就是，1979年在水稻种植面积减少、部分地区还遭受比较严重灾害的情况下，全省的粮食产量仍比1978年增产了十五亿斤。此外，其他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增幅，社员生活普遍有所提升。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广东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解决了长期以来吃不饱饭的问题，这也为之后广东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广东省委在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认识到：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1979年4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一个后来对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决定，即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充分利用自身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下午，习仲勋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

广东先走一步，放开干。”习仲勋内容实在、颇有新意的发言，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会议召开期间，习仲勋抽了一天下午的时间，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把广东省委的想法向邓小平到作了汇报。他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初步定名为“经贸合作区”。对于这一大胆设想，邓小平表示赞赏。当他听到因为意见不一致，“经贸合作区”的名字定不下来的时候，建议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的请求，并作出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问题。”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迅速决定成立领导小组，负责中央决策的落实。正如习仲勋所说：“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

党史人物

革命时期我们党如何讲好群众语言

□ 吴荣生

群众语言来自人民，源于生活，寓于实践，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语言艺术的宝库。学习和运用群众语言，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国人的语言之道，擅长运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日常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阐释党领导的革命，同时又赋予群众的日常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涵。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中国化的奠基人，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语言的伟大开创者。

用群众语言讲述“什么是革命”，唤醒民众大联合

对于古老的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历代新旧王朝的更迭甚至是农民起义都没有以“革命”标榜，大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或“光复”等。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一词，最早是由孙中山倡议使用的。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在向中国老百姓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时，既继承前人，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武装，多人多次使用过脍炙人口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典型性群众语言，明确展示了“革命”的现实意义和前所未有的崭新性质，切实深入人心、表达其意。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生活

在多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所在。据此，毛泽东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并正式提出了“三座大山”的概念，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极度苦难及其求变的迫切愿望。在谈到“革命”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时，为了方便理解和接受，毛泽东使用了贴合中国数量最多的大众——农民的生活且又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打土豪呀，分田地呀，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他努力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描述中国老百姓的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时局、分析问题、解决困难，因而很容易被中国劳苦大众所认可。对于中国化语言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毛泽东本人也曾给予充分肯定：“‘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这成为革命时期群众语言力量的集中展现。

用群众语言讲述“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动员劳苦大众

“谁来革命”回答的是革命主体的问题，“革谁的命”回答的是革命对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革命运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篇就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就革命宣传动员而言，毛泽东做出的“敌人”“朋友”“自己”的区分，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将脱胎于西方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纯理论性概念直接照搬照抄和教条化的使用，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中国化的内容转换和大众化的语言转化，使用了“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一整套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特征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概念尚未占据近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平台，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些概念更是相当陌生。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经典话语巧妙地替换为“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群众语言，既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符合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语言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话语的中国化理解和大众化表达。

用群众语言讲述“怎样革命”，武装广大农民

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在于将“怎样革命”这一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气派、中国的话语将“怎样革命”这一方法论问题向中国的劳苦大众阐释清楚，让他们听得懂、能接受并最终认可，进而达到发动群众革命的目的，是革命胜利的首要保证。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奋斗目标。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线及北伐战争。然而，早期我们党对革命的理解不够深刻，尤其是对革命的残酷性认识不足，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争取和掌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革命失败后，在汲取革命失败教训、调整革命斗争方式的紧要当口，毛泽东及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论断。高度凝练而又苍劲有力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和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成功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武装斗争道路的成功转型。之后，这一重要论断得到不断传承和提炼，最终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革命口号。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用群众语言准确提炼了游击战术的精髓，曾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巨大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史海拾贝

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

□ 刘祥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行动方向，也为党的建设指明方向。因此，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来展开、来加强。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气象更新，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在于把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坚持下来，并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总目标、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等，这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也是对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和维护。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承担这一重大政治责任。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政治目标、政治使命都无从谈起。

加强先进理论武装，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理论就是旗帜、就是方向，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保证。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践，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需要先进理论来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指导，更为我们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落实好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的要求，基础在于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利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武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筑牢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根基，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提升本领，不断提高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能力。

严格落实党章和党内法规，从制度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出台了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党章将党的政治路线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党内法规对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给予明确的规定，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必须牢固树立党章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始终尊崇党章，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内法规为基本准绳，把党章、党内法规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维护党章、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坚力量，是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坚持好干部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提升政治素质贯穿干部成长全过程，建立源头培养、跟踪

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培养对党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一支队伍，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在实践中把准政治方向、提升政治能力、锤炼政治品格，始终在政治上站得稳、靠得住、信得过。

锻造过硬作风，从行动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作风建设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和政府形象，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过硬的作风产生无穷的创造力、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战斗力，是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如果干部作风不正，党的形象就会遭到破坏，党的威望就会遭受损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逐渐丧失。锻造过硬作风，必须增强政治定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必须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始终保持真抓实干的作风，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要以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锻造过硬作风，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弘扬“马上就办”“钉钉子”和“严实细快”的作风，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纪律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高压线，谁都不能触碰。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实践证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坚决做到“五个必须”，严厉杜绝“七个有之”，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引导广大党员培育自觉维护政治纪律、执行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的新常态，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党建视界